论当代宗族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

王春伟,刘云涛,郭小荣(西京学院,陕西西安710123)

摘要　在分析了当代宗族正面与负面影响的基础上,讨论了其对农村现代化的作用。
关键词　宗族;农村现代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　F32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09)15-07298-03

Discussion on the Influences of Contemporary Patriarchal Clan on the Rural Modernization

WANG Chun-wei et al　(Xiji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3)

Abstract　Based on analyzing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s of contemporary patriarchal clan, its effects on the rural modernization was discussed.
Key words　Patriarchal clan; Rural modernization; Influence

1　农村现代化的内涵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它是多层面同步转变的过程,是涉及到人类生活所有方面的深刻变化。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是要解决长期以来抑制农村发展的因素,释放农村资源的潜力,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和文化繁荣。在我国农村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农村经济现代化、农村政治现代化、农村文化现代化以及农民的现代化等内容。

1.1　农村经济现代化　经济现代化的本身包含着3个层面:①物质层面,就是通常理解的人均产值、生活水平、工厂铁路等方面的增长与增加。②制度层面,它表现为经济秩序的建立与维护。③观念层面,指人民对经济生活的世俗化态度。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农村经济现代化主要指农业的机械化、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等,也就是指物质层面。其中农业现代化是其主要内容,农业现代化要求把传统农业变成现代农业,建立起广泛采用现代生产工具、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的农业生产体系,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集体程度以及农产品流通的专业化水平。

1.2　农村政治现代化　政治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的主要保证,西方学者一般将政治现代化分为3个大的方面,即权威的理性化、功能的分化和参与的扩大。在我国农村,政治现代化主要涉及到农村组织的现代化,其中村民自治是农村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组织。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表现。村民自治不仅是农村政治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也是推进农村政治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农村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政治生活的重大变革,对农村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以及农民民主权利观念、法律观念、参与意识的加强具有直接的影响,在农村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3　农村文化现代化　就文化本身而言,世界各个社会的文化并没有高低之分。并且现代社会中的文化不完全是现代的,其中有的还属于传统,所以才构成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但是文化是可以发展的,而且从现代性扩展的总体趋势来看,传统的文化最终会被改变。

1.4　人的现代化　即农民的现代化。现代化不单纯是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现代化,还有人的素质、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的现代化。"因为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1]。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化的过程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的根本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最终在于人。所以,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农民要具有现代化的素质,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科学知识、技术能力、现代思想应该是现代化农民的重要素质。因此,要引导和教育农民,最终实现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向现代化转变。

总之,农村社会现代化是一个全面的、全方位的进步过程,只有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农民意识等全部实现了现代化,才能说整个农村实现了现代化。

2　当代宗族对农村现代化的消极影响

由于当代宗族脱胎于封建的、落后的、守旧的传统宗族组织,其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般与"私利性"、"排他性"、"狭隘性"、"封闭性"等词汇相联系。具体来说,当代宗族主要在以下4个方面对农村现代化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危害:

2.1　对农村基层政治现代化的危害　传统宗族历来与封建专制相联系,而与社会民主相背离。由于当代宗族的复兴是基于传统宗族社会资本特性上的路径依赖,它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宗族的某些陋癖,为维护本族利益,复兴的当代宗族必然向当地政权渗透,干预农村的政治生活。虽然由于政府主导治理模式的存在使宗族影响还不十分明显。在当前农村社会推选村民自治、民主选举基层干部的活动中,宗族力量往往会利用血缘纽带关系形成利益团伙,采取非正常手段操纵村民选举,获取自治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选举工作的公正性、合理性以及村务监督的严肃性,干扰了村民自治的推行。由于宗族力量的影响,许多地方在选举中不是看能力、看威望,而是看是否是同姓同族,对同族的干部监督较松,不按原则要求办事,对异姓干部则吹毛求疵、要求苛

作者简介　王春伟(1980-),男,安徽宿州人,硕士,助教,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学研究。
收稿日期　2009-02-27

刻,如湖南临汀县8 个试点村中有4 个选举了各自的族长为村主任。某村赵姓宗族还恃强凌弱,用武力驱逐彭姓族长出村,打伤多人。[2] 有的宗族为了推选自己的村干部,互相串通、封官许愿、出钱贿选,干扰选举工作正常进行。张军等对山西省长治市南常村和南通村民自治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49 名选民中,有18 人在投票前与其他家族成员进行了商量,占被调查者的36.74%;其中有11 人是在与家族成员进行商讨后投的票,占49 人的22.45%,占18 人的61.11%。有8 人认为本村选举不公正,其中有3 人认为不公正的原因是家族操纵,占37.5%[3]。有的宗族势力一旦达不到目的,就砸烂票箱,破坏选举,激起族际矛盾,致使相当部分村级领导班子成为平衡宗族之间权力关系的舞台,如河南省的赵孟庄主要由赵孟两姓构成,共约800 口人。1994 年5 月,村委会选举,村委会主任及会计等3 个重要职位均被孟姓占有。于是赵姓村民砸烂票箱,导致选举失败,而不得不由赵孟两姓分掌权力[4]。

2.2　对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危害

(1) 农村经济中浓厚的亲缘性和家长式的管理,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扩大再生产和创造规模效益,形成了一定的阻碍作用。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产业结构合理化,逐步形成规模效益,而宗族力量渗入经济,较多的是为保证家族的眼前利益,一般不能从宏观全局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改善产业结构、扩大生产规模和追求长远宏观效益。

(2) 农村村办经济和乡镇企业经济中明显的家族化倾向形成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与现代化大生产所要求的平等竞争的人际关系,以及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的管理不相协调,在某种程度上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生活的要求。家长式的经营方式因缺乏民主,易形成企业中的裙带风、关系网,使企业缺乏内在的激励机制,造成企业经营效率低下。家族化经营排斥异族,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制约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由于从家族利益出发,易导致企业经营者目光短浅,摆脱不了小生产的经营方式,从而不利于经济管理和长远发展。家族化经营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与商品经济的开放性、竞争性不相适应,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3) 宗族活动对农村经济的消极影响还在于与当代宗族复兴相伴随的旧礼俗复活,使得族人的消费行为扭曲,极大的增加了族人的经济负担。在宗族观念的影响下,宗族群体内部旧礼俗日益泛滥。宗亲间的人情往来、畸型消费、红白喜事的超负荷操办,婚丧嫁娶的陈规陋俗日益蔓延开来,大操大办之风日盛,族人的人情债债台高筑。

(4) 宗族势力对当前农村社会危害最大的就是宗族械斗。械斗具有疯狂性,呈无政府状态,一旦发生轻则伤人,重则死人,不仅危害了社会安定,而且伤者的医疗、死者的安葬、亲属的抚恤等费用,打、砸、抢造成的经济损失,都由农户负担,给农民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械斗发生后往往毁坏山林庄稼和生产设施,破坏自然资源,使得边界关系紧张,影响了农业生产和边界地区经济发展。同时械斗的发生耗散了各级政府部门的大量精力。

2.3　对农村文化现代化的危害

(1) 滋生和传播落后意识。当代宗族的复兴也使一些带有封建文化印记的落后思想意识得以复活和蔓延,并导致落后行为方式的变态扩张。主要表现在:①严重挑战殡葬改革。土葬、建墓、大操大办、旧的丧葬习俗几乎全面恢复,出现丧葬文化的倒退。②严重冲击计划生育观念,家族伦理观特别强调承继家族世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娶无子,绝先祖祀”。因此特别重视子嗣,重男轻女,认为没生儿子就是断了香火。在家庭中,母亲的地位高于妻子的地位,妇女无子则在家庭社会中全无地位。此外而强调多子多福,生育不仅是传承宗族的手段,也是壮大宗族势力的手段。事实上,人丁一直是衡量宗族势力强弱、地位高低的标志,家里男丁多,势力就大,而小姓人家和无儿户则处境艰难。由此导致农村超生偷生现象屡禁不止。

(2) 助长封建迷信活动。宗族活动有时与封建迷信活动相伴随,宗族也借助于某些迷信活动来达到增强家族凝聚力目的。一些地方修家谱、续家谱、建祠堂、拜祖宗的活动十分普遍。有的族长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在本宗族的婚丧嫁娶活动中,扮演主要的活动组织者角色,要求族里人听从他们的安排,把早已简化了的程序再度复杂化,恢复过去的封建礼节旧规,族人如果不听从他们的安排,就会受到族规的惩罚。

(3) 破坏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宗族势力崛起以后,有些地方宗族族长在村里群众中的权威超过了基层干部。他们往往利用其威信拨弄是非,歪曲党和国家的政策,巧言误导群众,使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遭到破坏。

2.4　对人的现代化即农民的现代化的危害

(1) 人的现代化是针对“传统人”与社会发展的不相适应而作出的价值体系、人格特征等方面的重新构建,它不仅要求人在物质上和经济上成为世界的主体,而且要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上成为自己精神世界的主体,实现由宿命论、迷信和宗教热忱向理性化、知识化、世俗化的转变,实现由封闭、地域的人际关系向开放的人际关系的转变。而当代宗族的复兴使农民的行为目标集中指向个人和宗族的需要,主要依靠宗族的力量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力量来实现行为目标,强化了血缘关系,使农民的社会活动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对社会环境没有影响力,孤立存在于社会之中。这种孤立性“不仅使社会内部缺乏有机的联系方式和变革因素,而且使社会在与外界的联系中倾向于封闭和保守”[5],对社会发展和进步极为不利。

(2) 现代化要求人们有一种能适应所处环境变化的“转变性人格”,“要求人们把自己对具体的和与己直接相关的集团——家庭、宗族和村庄——的忠诚及隶属扩展成为更大的更抽象的集团的忠诚。”[6] 而复兴的当代宗族组织就恰恰使得个人直接向社会负责的“个人—国家”的社会模式退化为由宗族向社会负责的“个人—宗族—国家”的社会模式,再造了对个人的控制力,使人们对国家的忠诚收缩为对宗族的忠诚。特别是在宗族势力较强的地区,宗族通过宗族活动以及族训、祖规等规范使族人对宗族文化的认同感大大加强。这无疑重塑了那种传统社会对个人心理予以控制的文化环境,个人的独立性与创造性被压抑,与现代社会对个人的要求不相协调,不利于现代农民的培养。另外,还有一些聚族而居

的地区,在狂热的宗法观念支配下,村民们未能或难以实现自身角色意识的转换。他们的“族民”意识重于“公民”意识,在行为中注重的是自己与本宗族的关系而对自身与国家的关系意识淡薄。在狭隘、封闭的意识作用下,强调宗族、家庭的整体利益,宗族内成员以服从宗族的规范和需要为目标。这种狭隘的认同感和狭小的认同结构显然与现代化的精神本质也是不相协调的。

3 当代宗族对农村现代化的积极影响

当代宗族的复兴与蔓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宗族组织内在的社会资本特性与乡村社会发展的外在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正如许 光先生所言:“如果人们以一种方式而不是以别种方式将自己组成集团,并且这种特写的集团构成方式延续了许多代人和许多世纪,而且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变化甚至抵制变化的发生,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与该种集团构成方式有关的人们必定是在这种方式中发现了某些在其他集团构成方式中得不到的充足或满意。”[7] 当代宗族作为一种非正式组织,在目前广大农村地区还具有某些不可替代的功能性作用。①互助功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强化了村落家庭的生产性功能,使之重新处于决定地位。农村的小户经营特点使很多事情单凭一家的力量无法完成,此时宗族关系资源重新显得重要起来。②情感满足和社区认同的功能。这一方面是改革以前长期被压抑的心理和情感势能的释放,一方面也反映了处在现代社会的农民面对快速变迁的社会,乏力感成为普遍的心态,精神没有寄托。中国人对祖先十分敬奉,建宗庙、修宗谱以及宗族组织的各种节庆,反映出传统仪式还有着不可替代的情感功能。③一定的维持功能。村落宗族需要以一定的方式来维持其内部秩序,这与现代性力量的薄弱有关,社会体制不能充分取代宗族秩序。除此之外,当代宗族对目前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具体而言:

3.1 在政治现代化方面 我国的宗族文化、儒家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刻而广泛的互为因果的关系,以至于重在调整、规范家庭、宗族内部关系的宗族文化,在本质上属于对任何国家制度都有维护、稳定作用的“泛政治文化”。“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这段话虽然远未全面揭示宗法礼俗与政治稳定的全面关系,但已足以说明宗族文化和政治文化相为契合的传导机制。由于宗族文化具有上述性质,宗族及其活动自古以来就是政治权力的支持力量。当代宗族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组织,把同族人组织成一个严密、固定的社会群体。其家法族规强调责任义务、重视亲情与血缘关系、极力维护稳定的政权、反对社会动荡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基层政府工作中的某些薄弱环节。同时,可以借助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特别强调的“国家本位”等传统观念,借助于一年一次的祭孔、祭祀黄帝、炎帝以及各大宗族祭祀之际,广泛联系国内外一切爱国人士,建立更为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以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社会学博士宋平女士在对闽南一个宗族的个案研究中发现,当代宗族已经成为联结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东南亚的另一条跨国纽带。并且她进一步指出,传统可以被创造出来当作为政治或经济利益服务的工具。通过它的延续和变迁,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文化认同的意义[8]。此外,当代宗族还有利于增进“利益集结”,提升农民作为一个团体的话语权力,为原子化的个人提供了一条利益表达的渠道,改变农民在与地方政府博弈中的不利地位,并对基层党政干部进行监督,促使其提高政治和业务素质。

3.2 在经济现代化方面 当代宗族作为农村的自然组织,不同于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宗族内部的关系直接根源于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成员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和精神依存,文化价值和习俗规范促使他们向其他成员提供必要服务,从而使宗族内部交往成本大大降低,给每个个体实现效益最大化提供了机会,优化了农村社会关系。如农村改革后产生的大量的单家独户的小农,由于生产力落后、生产规模狭小,很难使农民家庭生产和生活实现效用最大化,而有着天然的人伦和亲情的族内合作成为农民最现实的可以利用的有效社会资源。这种优势在当前家族企业发展中表现的更为明显。由于当前农村工业的基础差、底子薄,宗族关系网络的支持、宗族资源的运作为家族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优势条件。在企业初创时期,信息和资金是2 个关键因素,这恰恰是在宗族内部较易得到解决的。来自宗族成员的信息往往比较准确、及时和可靠。宗族成员在长期交往过程中互相了解、彼此信任,因此在筹措资金时较为容易,在使用资金时也因为较合理而得到家族成员的支持。家族化企业在生产、技术、销售等方面也能得到诸多便利,使企业在创办和发展时会很顺利。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李庚寅的研究表明,总的来说,往往是在那些传统治理模式的家族企业中,领导人之间、员工之间的信任程度越高,所付出的信息成本也就越低。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并非家族企业的管理制度就是落后的制度。虽然从家族业主制向现代股份公司制度转化是一般的趋势,但是家长制的管理制度在一定的环境中仍然是效率较高的制度,尤其是在当今中国总体信用环境不好、制度意识严重缺乏的条件下,传统的家族治理模式不失为一种适应性选择[9]。

3.3 从文化现代化方面来说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复杂,然而其共同的中心点就是忠和孝,忠就是忠君,孝就是孝亲。围绕着忠和孝,又衍生出许多新的文化特质,因为忠,所以对家庭和国家要尽忠尽职,不辱使命;因为孝,所以要显扬父母,光宗耀祖,力争上游,并且要尊敬父母,尊敬长辈;因为忠和孝,所以才念旧崇古,趋向保守。而上述的许多传统文化特性恰恰正是宗族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因为忠和孝正是血缘在观念上的反映。所以,当代宗族特别强调社会教育作用,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农村社会发展实践已表明:在我国的许多地区,宗族文化表现出一种很强的适应性。几乎每一个宗族组织都教育其族人恪守本族的传统美德,并以其所认可的儒家思想中的传统伦理观教育族众,促进了我国社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如浙江省兰溪市诸葛八卦村是诸葛亮后裔最大的聚居地,现该村中有亮之后裔3 000 余人,他们恪守先训、弘扬祖德,以经营中医药业见长,共经营大小药店200 余家。他们免费为贫困者诊病,更热爱地方事业,成为当地家

(下转第730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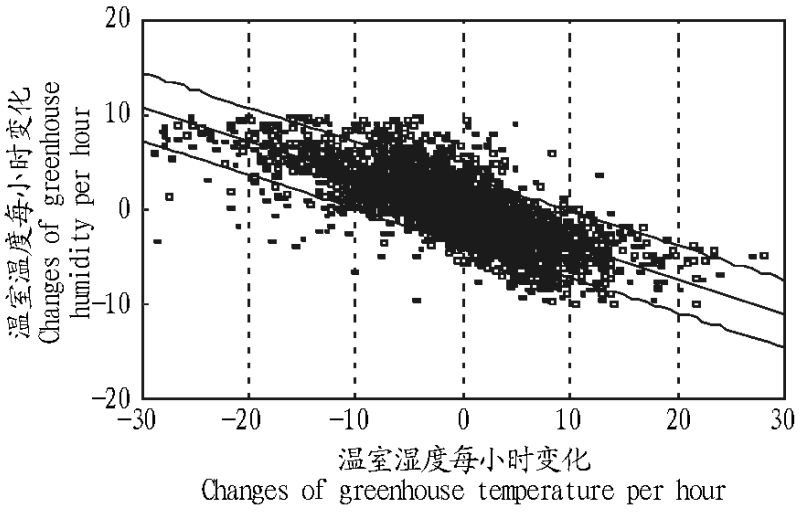

图2　温室温湿度变化散点示意

Fig.2　The scatter of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changes

系列参数因子和辐射系列参数因子内部的相关性,充分反映了原始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非测量温室参数因子的影响。

(2) 提出了一种只基于温室参数因子数值的温室数据分类方法。相较现行的依据季节,时间的温室数据分类方法更为合理。

(3) 得出了可靠性高的温室数据类别三参量的线性判别函数。

(4) 对各类别中的温室温度变化率、湿度变化率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了在各类别中有一定可靠性的、简单的相互作用函数。

(5) 在仿真建模控制参数调整时,通过上述方法,更能反映实际情况,得出尽可能准确的控制参数。在温室温湿解耦控制中,依据各数据类别的温湿度变化率线性关系。可以确定更准确地解耦方式[16-18],实现更好的控制。

参考文献

[1] 韩敏. 智能温室监控系统的研究与实现[D]. 杨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7.
[2] 吴春艳, 赵新平, 郭文利. 日光温室作物热环境模拟及分析[J]. 农业工程学报, 2007, 23(4): 190-195.
[3] 李晋, 秦琳琳, 岳大志, 等. 试验温室温度系统建模与仿真[J]. 系统仿真学报, 2008, 20(7): 1870-1875.
[4] 王成, 王丽丽, 许薇薇, 等. 基于数据仓库技术的温室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J]. 农机化研究, 2000(4): 96-98.
[5] 赵影, 夏彬, 王娜. 多变量数据采集及控制在温室栽培中的应用[J]. 电气传动, 2007, 37(4): 52-54.
[6] 赵斌, 王克奇, 匡丽红, 等. 我国温室环境的模糊控制技术应用现状[J]. 自动化仪表, 2008, 29(5): 1-4.
[7] 王子洋, 秦琳琳, 吴刚, 等. 基于切换控制的温室温湿度控制系统建模与预测控制[J]. 农业工程学报, 2008, 27(7): 188-192.
[8] 李晋, 秦琳琳. 现代温室温度系统在线建模[J]. 信息与控制, 2008, 37(4): 501-508.
[9] 张娟, 陈杰, 刘志勇.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温室决策支持系统[J]. 微计算机信息, 2007, 23(1/3): 169-170.
[10] 鲁茂, 贺昌政. 对多重共线性问题的探讨[J]. 统计与决策, 2007(4): 6-9.
[11] 张文彤. SPSS 统计分析教程(高级)[M]. 北京: 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 2002: 4-5.
[12] LOPES HEITOR S, WEINERT WAGNER R. Egipsys: an enhanced gene expression programming approach for symbolic regression problem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S1641-876X), 2004, 14(3): 375-384.
[13] ALLISON PAUL D. Event history: analysis regression for longitudinal event data[M]. Series: Quantitative Ap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1984.
[14] COX D R. Regression models and life table[J].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B, 1972, 34: 187-202.
[15] DILLON W R, GOLDSTEIN M. Multivariate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M]. New York: Wiley, 1984.
[16] 张峻颖, 唐新南. 烟叶烤房温湿度模糊控制系统的设计[J]. 农机化研究, 2008(8): 65-68.
[17] 周克良, 张建荣. 基于ARM及模糊解耦控制的人工气候箱控制系统[J]. 仪器仪表与分析监测, 2007(3): 3-5.
[18] 马明建, 李宝光, 宋越东, 等. 基于直接推理的温室环境多变量模糊解耦控制[J]. 农业机械学报, 2003, 34(6): 116-119.

(上接第7300 页)

族发展中的一个楷模[10]。另外,宗族文化具有凝聚村民的作用,并且丰富了村民的闲暇生活。宗族文化是广大村民精神生活的寄托所在,能满足村民的心理和文化需要,减少或降低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心理失衡时可能出现的失落、迷惘以至报复情绪,从而可以稳定地方秩序和人心。

总之,正如钱杭先生所言:"由宗族文化传统所代表的那种自身及其所属群体价值的深刻的历史性认同,恰恰是现代商业社会中浮躁短气、急功近利的人们最为缺乏的一种修养和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宗族的重建和转型,既不是偶然的和随心所欲的,更不是没有意义的。"[11] 它对于舒缓社会性的紧张,稳定地方秩序和人心,稳步实现乡村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当代宗族复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的自我治理能力,帮助推动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运行,并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农民的生活港湾和情结网络,对于农村治理与社会和谐稳定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4　结语

综上所述,宗族组织作为农村社会有史以来就客观存在的一个重要变量,作为当前农村为数不多的既存组织资源,它对农村现代化的意义是辩证的,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是双重的,即既有消极的一面,又有积极的一面。一方面它给农村现代化带来了某些障碍和一定的冲击;另一方面它在某种意义上又成为农村基层正式组织的一种有益补充,有助于避免农村社会的失范和无序。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虽然传统宗族在本质上是落后的,但当代宗族并不尽然。因此,对于现阶段农村社会中的宗族组织以及宗族因素,应该实事求是,抛弃陈旧观念,用一种科学的态度对待。

参考文献

[1] 英格尔斯. 人的现代化[M]. 殷陆君,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2] 毛少君. 农村宗族势力蔓延的状况与原因分析[J]. 浙江社会科学, 1991(2).: 52-57.
[3] 张军. 关于村民自治的思考[C]//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310-317.
[4] 王克安. 中国农村社区发展模式: 个案实录与问题对策[M]. 长沙: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623.
[5] 王宽让, 贾生华. 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化[C]// 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丛书.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31.
[6] 塞缪尔·P·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9: 30.
[7] 许　光. 宗族、种姓、俱乐部[M]. 薛刚,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0: 61.
[8] 宋平. 传统宗族与跨国社会实践[J]. 文史哲, 2005(5): 88-96.
[9] 李庚寅, 王孝仙. 家族企业中的信任机制、效用与信息成本[J]. 财经研究, 2004(7): 113-120.
[10] 琚红征. 孔明后裔造福乡里[N]. 健康报, 1997-04-05.
[11] 贺雪峰. 人际关系理性化中的资源因素——对现代化进程中乡土社会传统的一项评述[C]//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 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